

导 言

—

中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野蛮侵略下进入近代的。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形态是一个畸形的社会形态，中国近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

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四二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在此之后，资本主义侵略者又接二连三地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勒索了巨额赔款，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一切侵略特权。它们又在中国各地商埠强开‘租界’，强占中国沿海的港口，并把中国的广大领土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此外，它们又逐步驯服、控制了中国的历届反动政府，使其成为它们的工具、走狗、代理人。总之，从一八四〇年起，中国逐步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沦为被世界各主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客观上也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列强的本意，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而不是要把中国变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们的经济侵略，客观

上势必要破坏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刺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具体来说，“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9—590（页）于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制束缚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始终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始终没有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近代，中国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封建社会。

近代的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来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侵略、压迫、统治下，近代的中国，国家贫穷落后到了极点，人民困苦到了极点，灾难空前深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陷中国于危亡、陷人民于苦难的两大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同上书，第594页）。因此，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人民的主要革命任务。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整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都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为分界，又划分为新旧两个时期。本书所讲的近代，系指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际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半期。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2页）简括地说，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

经济及其变化，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和表现。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改造中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使人民摆脱苦难，这是近代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为了实现这一宏志大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斗争。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在黑暗中百折不回地艰难求索。在中国近代思想界，除封建反动势力外，大都认为贫穷落后、濒临危亡的古老中国必须变革、改造。因此，谈“变”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各个时期的共同话题，十分引人注目。但是，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变革、改造？中国究竟应当向何处去？前途出路何在？各阶级、阶层、政治派别的回答是各不相同的。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国人，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他们曾对中国的“病症”作了种种不同的诊断，开出了一付又一付不同的“药方”，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变革方案，为未来的中国设计了一幅又一幅的蓝图。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形象一点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先辈们寻找中国前途出路的“寻路记”。这是他们留下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它将使我们后人从中受到多种启发，获得宝贵的教益。

中国近代这一艰难曲折的“寻路”历程，大致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等六个历史阶段。相应出现了六种社会思潮，即地主阶级革新思潮、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洋务思潮、资产阶级维新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思潮、激进民主主义思潮。这六种思潮代表了六个不同阶级、阶层、政治派别的利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时代要求，同时又对时代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中国近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中国社会

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深刻、巨大的变化。因此，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斗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尖锐激烈、错综复杂，所涉及的问题也空前广泛。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充满了变与不变之争；“用夷变夏”与“用夏变夷”之争，革新与守旧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体用本末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科学与迷信之争，对外抵抗与对外妥协之争；“以农立国”与“工商立国”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新道德与旧道德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文学与旧文学之争，新史学与旧史学之争，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所有这些，归结起来，主要是新与旧、中与西之争，亦即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争、进步与反动之争。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斗争，是紧紧围绕这个历史时代反帝反封建的总任务展开的，是这一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是我们的“昨天”。昨天思想领域的斗争同今天思想领域的斗争是息息相关的，中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此，今天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

在近代，向中国发动野蛮侵略的西方列强，是一些文明程度高于中华民族的异族。他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新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文明明显不同于并高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明。它受到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仇视、排拒，但却很快吸引了先进的中国人，为他们所欢迎、接受。因此，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眼睛是盯着西方的。正象后来毛泽东所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

集》第1358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学习西方,输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西学东渐”史。离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输入、影响,离开‘西学’与‘中学’的冲突、斗争、交融,就说不清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斗争和变化,说不清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启蒙。因此,在本书的开头,我们有必要先对这一问题作一番概括的回顾和考察。

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无不向西方寻找真理,这是历史的必然。当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僵死、停滞,没有丝毫活力。统治中国的清朝,已结束了“康乾盛世”,正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在当时,不仅老大的中华帝国在走向没落,而且整个古老的东方都处于衰败之中。与此相反,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危机业已暴露,但是,比之东方的封建制度,它仍然是优越、先进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西方的财力、物力、兵力,西方的工艺技术、科学文化、学术理论、政治经济制度,总之它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国人、东方人惊羨不已。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一兴一衰,一强一弱,一富一贫,一治一乱,对比实在太鲜明、太强烈了。这鲜明强烈的对比,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对中国“圣人之道”的崇敬与迷信,转而向西方寻找真理。在这期间,一八六八年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取得显著成效,这就更坚定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信心和决心。

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也是由资本、帝国主义侵

略者逼出来的。大体说来，在每次大的民族危机之后，总要出现一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魏源关于“师夷”的主张，提出于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提出于中法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危机的年代。康梁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是在中日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西方，则是在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所以要学习西方，是为了有效地抵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魏源开始，便鲜明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的口号。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宣称，所以要学习西方，是为了“雪国耻而保疆宇”（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陈天华更明确地说：“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猛回头》）；“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警世钟》）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是为了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具有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

随着中国的内外危机日益深重，封建制度的反动性、腐朽性日益暴露；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缓慢成长；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和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由表及里、步步深入的。

在开始一个时期，由于中国人刚刚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惊醒，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看西方，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了解是很肤浅的。而且，他们对本国封建主义的认识，同样是不深刻的。那时，西方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是“船坚炮利”、“工艺精巧”；中国人所看到的自己的不足，也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由于那时的中国尚未出现新的经济、政治力量，所以这一时期地主阶级革新派、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和洋务派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特别是军火武器制造，即从“物”的方面学习

西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便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早期维新派开始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公开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封建制度优越。他们认为，西方所以富强，其根本原因并不在‘船坚炮利’；而是由于在经济上‘以工商立国’；奖励支持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在政治上实行了“议院之法”，建立了民权民主制度。中国要想独立富强，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制度上学习西方，进行全面的变革。起初，维新派是以英、日为榜样，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后来，革命派又认为民主共和为“最美最宜之政体”，他们要求效法美、法，通过革命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此，他们先后领导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而后者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是，辛亥革命后假共和的严峻现实使激进民主主义者认识到，共和政体、代议制度固然重要，但仅靠这些并不就能真正实现民主。要想在中国建立名符其实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洗刷”存在于中国人之中的各色封建主义旧思想，树立民主主义新思想，在思想领域进行一场‘大激战’。他们的眼睛不再仅仅盯住一个政体问题，而是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旧观念，大力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他们更深入地进行中西文化异同的对比，探讨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致说来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虽然，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是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把西方资本主义看作尽善尽美、一切皆好，而是以比较清醒、理智的态度来观察、认识西方的。他们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比之中国封建主义的优越性，又看到了它的弊端，看到了它内在的矛盾和危机。他们既看到了封建主

义将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又对资本主义的命运前途表示担心。因此，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既向往，又不甚满意，既有赞美讴歌，又有揭露批判。大致说来，随着中国人对西方的观察认识一步步深入，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矛盾和危机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论著中，我们可以找出不少对西方资本主义揭露批判的言论，其内容涉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个重要方面。

在政治上，一些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代议制作了尖锐的揭露批判。对此，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都曾发表过一些议论。章太炎指出，西方的代议士名为选举产生，实则‘营求入选所费金无虑巨万’（《官制索隐》），结果‘选充议士者大抵出于豪家’（《五无论》）。他的结论是：‘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代议然否论》）。西方的共和政体并非‘政治极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只是和君主制相比‘于祸害为差轻，固不得已而取之矣’（《五无论》）。

在经济上，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指出，垄断的形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的贫富不均乃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病症。严复说：“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原强》）谭嗣同也指出西方“富者日盈，往往埒于国家，甚乃过之。……其富而奸者，……把持行市，……其力量能令地球所有之国，普受其损，而小民之隐受其害，自不待言，于事理最为失平，于是工与商积为深仇，而均贫富之党起矣。”（《报唐佛尘书》）孙中山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他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民报发刊词》），由于贫富极端悬殊，在西方“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了（同上）。

在伦理道德上，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方面称赞西方资产

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原则和理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堕落，并指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在西方并未能真正实现的事实。

总之，中国近代一些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思想蒙都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尽善尽美，西方社会并非桃源乐土、人间天堂。

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人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却能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弊端，甚至得出资本主义前景黯淡的结论，从表面看这是不好理解的。但是，如果把这一现象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则是不难理解的。

第一，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相比，他们是晚辈。当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已暴露无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西方蓬勃兴起。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就不仅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比中国封建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又看到了它的危机和可忧的前景。

第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是革命者、先进者。他们的思想家和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样，“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他们“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8页）他们以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为己任，自以为能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弊端。因此，他们较少偏见，较能面对现实、正视矛盾。

第三，当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早已诞生，各色社会主义正风行于欧美。中国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曾程度不同地接触到西方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其中既有空想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有科学社会主义），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这种情形也使他们能够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危机。

第四，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时时为“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毛泽东语）这个问题所折磨和苦恼。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必然要刺激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去更清醒、全面、深入地观察资本主义制度，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总的说来，在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是以复杂的矛盾心情向西方学习的。他们既然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矛盾、危机，因此，他们中一些人试图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孙中山主张，在反清革命的同时，通过“平均地权”来“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避免革命成功后出现贫富不均的问题，使“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在中国“永绝”。为了防止政治上的种种“流弊”，他又主张改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五权分立”（《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章太炎也曾提出过“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官立工场，使佣者得分赢利”“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公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五无论》）等四项除弊、改良的措施。但是，指望通过这些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使贫富相安，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人指望通过发扬道德心、发扬抽象的人类之爱来消除资本主义的黑暗、丑恶，这更是幻想。

另有一些人则干脆主张重新选择道路。其中，有的人转而鼓吹无政府主义。他们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只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未尝有利于多数人民”。因此，中国断不能走西方老路，而必须“另筹革命之方”，走新的即无政府主义的道路。有些人则走了回头路，掉头向封建主义投降，走向了复古主义。

另外，在中国近代，谈“社会主义”者也大有人在。但是，他

们的社会主义，不是主观、空想，就是无政府主义，或者仅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学说来研究、介绍。

总的说来，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弊端，却无力克服、消除它。他们中的一些人所重新选择的道路也都不是中国的出路。

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苦难的中国人不断觉醒的历史。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炮声中，先进的中国人痛感自己的落后，因而要求学习西方，进行变革，这标志着近代中国人的伟大觉醒。进而，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并试图对它进行改良，使之完善，这标志着近代中国人的进一步觉醒。可是，他们试图改良资本主义或是另寻路径的种种方案并未能给苦难的中国指明正确道路。这个严峻的事实不能不给中国人又带来新的刺激。大致说来，从以往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到对它有所怀疑、不满，最终却对它无力补救，这就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的总过程。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近代中国人新的、更伟大的觉醒。



在中国近代，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由于社会处于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因此，思想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局面。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近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化时代，是一个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地位十分重要。

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角。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为了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变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斗争，同时又在意识形态诸领域

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和斗争。他们力图改造那一套与新的经济政治、新的社会存在不相适应的旧的意识形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以服务于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变革。为此，他们又进行了哲学的变革，并发动了“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史界革命”，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了孔子和孔教，出现了所谓“圣贤革命”。这些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大事，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的重要内容和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哲学的变革。

处于大动荡、大转折、大变革之中的中国近代，是一个比以往更需要哲学的时代。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新的哲学来帮助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资本主义变革作哲学的论证。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他们的思想家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其中既有机械唯物论、唯物主义经验论、近代无神论，也有各色唯心论、唯心史观。与此同时，他们又对中国的封建官方哲学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并在继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同时，力图克服它的朴素性、直观性。在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它同中国的古代哲学相比，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它的产生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变革。但是，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又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形态，是一种中与西、新与旧杂凑的形态。它未能完全超脱古代的形态，并不完全是近代的，更不完全是西式的。

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是紧紧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服务的，这是它突出的优点。中国近代是一个火热的斗争时代，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以探索自然、社会、历史诸问题，进行哲学的沉思，大都是出于斗争的

需要，迫于形势的驱使、刺激。这和古代的一些哲人，在宁静的书斋中悟道谈玄是大不相同的。先进的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对于推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曾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维新派的“变者天之道也”的变易哲学和“公羊三世”的进化史观，对于呼唤变法维新的风雨，无疑起了重要作用。革命派关于“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的思想，对于激发革命的风潮，同样起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天命鬼神说的批判，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反封建斗争，也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紧紧为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优点，那么，粗浅、杂乱，缺乏成熟的体系则是它的缺点、弱点。如前所说，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制、束缚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不充分，中国资产阶级是幼稚、软弱的。在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同样也不发达。中国资产阶级哲学赖以建立的基础——不论是阶级的还是科学的基础都是脆弱的。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社会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呱呱坠地之日，正是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时。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中国资产阶级刚一诞生就不得不立即投入紧迫的政治斗争，投身于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救亡图存运动。为了紧迫斗争的需要，他们的思想家们曾紧张地从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料中吸取养料，来不及细致地咀嚼、消化、整理、创造，就急促地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自己的方案主张。客观的环境不允许他们有一个比较充裕的理论准备阶段。梁启超对此曾有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清代学术概论》）这虽是梁氏讲他个人的经历，但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整整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生动写照。以上这些，就决定了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不可能很成熟

精深。自然，我们决不是说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没有某些深刻的思想和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总的说来，它未曾达到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成熟发展的水平。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虽然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某些人的哲学思想具有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但总的说来机械唯物论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并不占优势。相反，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主观唯心论的色彩是比较突出的。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大都夸大“心力”，走向主观唯心论，这既有认识根源，也有阶级根源，这些在本书的有关章节将作具体分析。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未能为本阶级创造出强有力的哲学武器，他们的哲学并不能解决近代中国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倡导的“道德革命”，也是影响巨大、十分引人注目的。

所谓道德革命，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旧道德，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资产阶级道德革命的兴起同样不是偶然的，它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政治的新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虽然，道德革命的口号是在二十世纪初提出来的，但它的历程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即已开始了。在戊戌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拉开了道德革命的序幕。二十世纪初革命派兴起后，道德革命进一步高涨。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道德革命达到高潮。在这三个时期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对封建的伦理纲常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大力宣传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思想，要求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他们中一些人又宣传了“求乐免苦”的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批判了“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他们中许多人公开宣扬“利己”、“为我”，为私字大唱赞歌。不过，他们并

没有提倡极端的利己主义,而是主张“知有爱他的利己”、“自利利他主义”。因此,他们在宣扬利己的同时又强调利群、爱国、爱他。他们的这套主张,实际上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其本质依然是利己。此外,他们大都过分强调道德在变革和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因而带有唯心主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

资产阶级所倡导的道德革命,使中国封建的纲常礼教和伦理学说遭到了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从此,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过道德革命的洗礼,中国的道德、风尚、习俗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时代是很明显的。同时,它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道德革命的任务在近代并没有完成。这同样是因为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始终割不断同封建主义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封建的勇气。他们不论是批判封建旧道德还是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都有程度不同的保留。而且,如前所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刚刚出世就不得不投入紧迫的斗争,他们在道德革命中的理论准备同样也是不充分的,这同中国封建伦理学说系统完备、源远流长的情况是极不相称的。另外,由于他们轻视并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所倡导的道德革命并没有深入到广大底层的民众中去,远远不足抵消根深蒂固的封建旧道德的极深的影响。

整个说来,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曾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发动了广泛、猛烈的冲击,做了大量有益的启蒙工作,使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巨大的变化,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由于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影响至深,他们并未能彻底地战

胜、成功地改造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不论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变革、道德革命，还是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情形大致都是如此。显然，这种情形是由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总形势所决定的。中国的历史道路是，彻底批判、改造、清理中国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和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都一齐遗留给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

第 一 章

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 革新派的思想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 社会和思想界

一、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前，欧美主要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古老的中国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虽然，从十六世纪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在封建势力的束缚下，它的发展十分缓慢、势力十分微弱。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剥削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关系。历代相沿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从各方面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统治秩序。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的上层建筑已完全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总的形势是停滞、僵化，日益丧失其活力。

在鸦片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中，统治中国的清朝正一步步走向